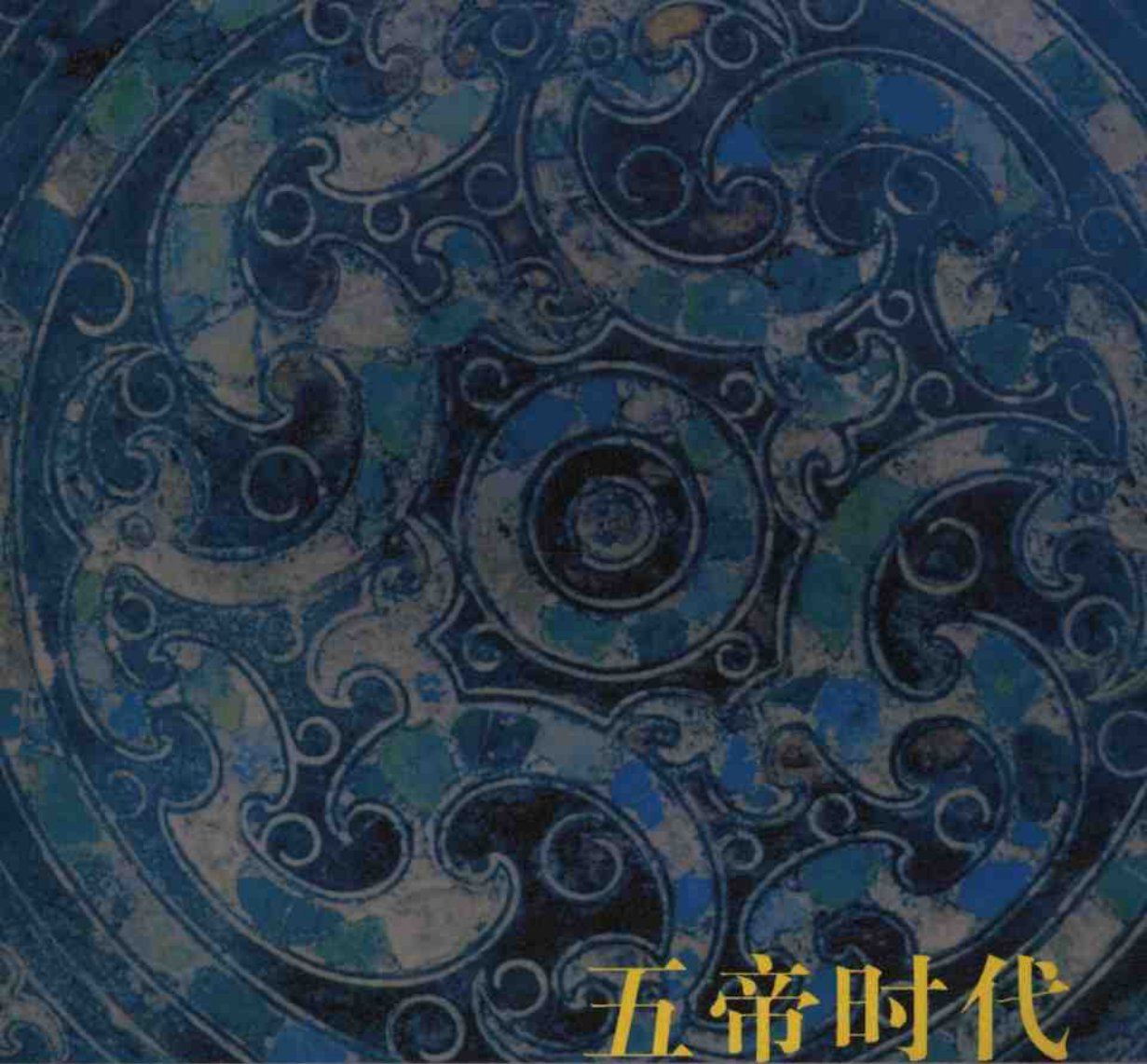




五帝时代

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

韩建业 杨新改 著

學苑出版社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

北京市属市管高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

五帝时代

——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

韩建业 杨新改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
韩建业,杨新改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12
ISBN 7-5077-2782-3

I. 五... I. ①韩... ②杨... III. 原始社会考古—
中国—三皇五帝时代—文集 IV. K8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9809 号

责任编辑:潘占伟

封面设计:徐徐书装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c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4055 67675512 67678944

印刷厂:河北省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本尺寸:720×980 1/16

印 张:13.5

印 数:1—2000 册

版 次: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韩建业，甘肃通渭人，1967年出生。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2000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拔尖创新人才。已在《考古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等多部。

杨新改，山西新绛人，1969年出生。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1991年毕业后到中学任教，1995年调到科学出版社担任考古图书编辑，2006年到文物出版社工作。发表了《禹征三苗探索》等论文，合作编著了考古发掘报告《驻马店杨庄》。

前言

一、关于五帝时代

司马迁著《史记》，径以《五帝本纪》为开端。在《五帝本纪》的赞里，司马迁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诸多学者都称道五帝，说明其实不虚，但由于多出传说，因此对于细节方面的纷纭众说，连太史公也难以取舍。

“帝”这个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本意类似现在所说的“神”，引申意指祭帝的礼，后来加示旁作“禘”^①。从甲骨文来看，商人对先公先王也行“帝”礼，因此虽然未见直接称他们为“帝”的情况，但不能排除商先公先王以及其他古人也有可以称“帝”的可能。至西周春秋时期，除了“皇天上帝”（《尚书·召诰》）、“皇矣上帝”（《诗经·大雅·皇矣》）这样的用法外，在《国语》、《左传》中明确出现具有人格的“黄帝”、“炎帝”、“帝喾”等，其他颡顼、尧、舜、丹朱以至于夏商诸王也都可以“帝”相称，对于帝名的用法显得颇为随意。在战国后期的文献中，才出现“五帝”一词。最早在《荀子》中出现3处，《战国策》中也有三处，且多与三王、五伯并举。在《吕氏春秋》中更是有14处之多，一般连称“三皇五帝”或“五帝三王”。这显然是当时五行学说或者五德始终说影响的结果，又与“帝制运动”有关^②。正如徐旭生所说，“是先有五帝的观念，以后才找五位帝的名字来充实它”^③。由于拟订“五帝”名单的人的立场、见解、时代不同，就出现了不止一种结果，刘起钊共归纳出七种五帝说^④。这七种组合的五帝，其实只有前三种最值得注意，后四种因为都是汉代以后依据不同需要和体系重新编排的结果，其中第七种更是指东汉纬书《河图纬》中提到的天上五方五帝，所以大可以略而不论。

前三种五帝说，第一种为黄帝、颡顼、帝喾、尧、舜，明确出自《大戴礼

①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8～199页。

② 顾颡刚、杨向奎：《三皇考》，《古史辨》第七册（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③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04页。

④ 刘起钊：《几次组合纷纭错杂的“三皇五帝”》，《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记·五帝德》^①，更早的出处却在《国语》。在《国语·鲁语》中有这样一段话：“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不正是在说五帝吗？不过在这段话的后面又提到了鲧等八位古人，显然并没有特别突出这五人为五帝的意思。这种说法当是各种五帝说中最有根据的一种，《史记》惟独采用此说，足见司马迁的非凡鉴别能力。第二种五帝说为庖牺、神农、黄帝、尧、舜，出于《战国策·赵策》^②。其中黄帝、尧、舜是和第一种相同的，但却在前面加上了战国时期流行起来的庖牺、神农。第三种五帝说为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始见于《吕氏春秋·十二记》。早先顾颉刚曾对第一、二种说法做过深入辨析，认为他们分别是战国衍衍时的“前期五帝说”和秦以后的“后期五帝说”^③；徐旭生曾对第一、三种说法进行过重点讨论，认为他们分别属于华夏集团的和东夷集团的后裔的主张^④。

由此可见，实际上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五帝”。但这并非说纳入“五帝”名单的那些古人没有实际存在过，或者“五帝”的名单可以随便开具。可以设想，从众多传说的古人中仅仅挑选出五个人来做为“帝”，那应当是一件十分审慎的工作，只有在传说中举足轻重者才可以入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使用“五帝时代”这个概念，指称以“五帝”为代表的那个时代^⑤。五帝时代已经有了文字，但还比较幼稚而不足以记录大事，我们只是从周代的文献中才见到关于这个时代的记述，那多半是“口耳相传”的结果。因此，五帝时代属于“传疑时代”^⑥或“传说时代”^⑦的范畴，相当于西方人所谓“原史”时期。不过，“五帝时代”只相当于“传疑时代”或“传说时代”的早期阶段，其下限至于夏王朝的建立，而徐旭生所说的“传说时代”下限至于盘庚迁殷，夏曾佑所说的“传疑时代”的下限更晚至东周之初。

二、埋在地下的古史系统

自秦汉以后，虽有经今古文之争，有唐宋乃至清代学者对古书古史的疑

① 《大戴礼记·五帝德》：“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帝喾……玄囂之孙，鲧极之子也，曰高辛。……帝尧……高辛之子也，曰放勋。……帝舜，……鲧牛之孙，瞽叟之子也，曰重华。”

② 《战国策·赵策二》：“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易·系辞下》也是这种排列。

③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④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7～204页。

⑤ 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中的“五帝时代”一词，就是这个含义。

⑥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38页。

⑦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

辨整理，可其辨别和分歧都集中在细节方面，从来没有人从整体上否定五帝时代这个古史系统。但自晚清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碰撞幅度的加强，中国的弱势地位日益明显。不少人开始转向西方寻求真理，并对中国上古史产生怀疑，疑古思潮在中国乃至日本、欧洲逐渐蔓延开来。夏曾佑于1904年出版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就曾将东周以前都归入“传疑时代”。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的陆续印行，疑古思潮达到顶峰，甚至有人提出极端的“东周以上无史”论。当然在20世纪前期并非只有一种声音。除和顾颉刚等互相辩驳的刘掞藜等人外，还有王国维、蒙文通、傅斯年以及稍后的徐旭生等，他们都不同意过分疑古。王国维认为，连尧、舜、禹都加以怀疑显然是疑古太过^①。蒙文通和徐旭生并且都依据传说史料，将上古的中国划分为三大民族或三大集团^②，傅斯年则提出夷夏东西说^③。冯友兰曾提到信古一疑古一释古的三阶段说，主张应以释古代替疑古^④。但信古也好，疑古也好，释古也好，都基本局限在狭义的史学本身。由于利用的是传说资料，难免错综复杂，即使用功再勤、方法再正确，也难以让人尽信。

显然，探索古史不能仅依靠传世文献这一条路。于是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地下材料的重要性，对新产生的考古学寄以厚望。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地下的和地上的证据相互印证^⑤，所谓地下证据虽然主要只是出土文献资料，但其着眼点已与传统有别。李玄伯提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⑥顾颉刚也认为，地下出土的古物所透露出的古代文化的真相，可以用来建设新古史，也可以破坏旧古史^⑦。徐旭生不但重视地下材料，而且身体力行，早年主持发掘了宝鸡斗鸡台墓地，晚年调查发现了偃师二里头等重要遗址^⑧。尹达在晚年也提出结合考古学以研究古史的要求，还特别指出：“从地上，从绝对年代上，从不同文化遗存的关系上，都可以充分证明这些神话般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⑨在新近出版

① “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反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见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② 蒙文通：《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③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1935年。

④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世界日报》1935年5月14日。

⑤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⑥ 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⑦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⑧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11期。

⑨ 尹达：《衷心的祝愿——为〈史前研究〉的创刊而作》，《史前研究》创刊号（1983年），第5页。

的由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的《序言》里，有这么一句话：“若从整理传说史料本身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①

史前考古资料长埋于地，没有人为窜改增删的可能，其客观真实性毋庸置疑，的确是传说史料的最可靠的参照系。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工作，这个参照系的内在逻辑秩序和主要内容已经逐渐被破解释读，中国史前（原史）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如果真有过一个“五帝时代”，那么那些人们集团的遗存及其时空框架也应基本被发现。可以说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了两个古史系统，一个在传说史料中，一个在史前考古资料中，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方法，达成二者之间的互证与互释。

三、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方法

时至今日，夏商周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已取得辉煌成就。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使晚商史成为信史；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二里头等遗址的发现和研 究，确认了早商史和夏史的基本框架。今天大概没有什么人会再提什么“东周以上无史”论了。回顾夏商周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历程，有两点是起到重要作用的：一是由近及远的方法，二是点面结合的方法。由近及远即由已知推未知，由晚商推到早商乃至夏代，强调的是已知基点的重要性；点面结合是都城这些关键点与特定族属文化分布面的结合，强调的是都城基点的重要性。这两点仍然是我们探索五帝时代古史时要遵循的基本方法。当然，夏商周考古学的探索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或过分强调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的一一对应，殊不知文化的发展变化还受族属以外其他因素的制约；或过分注重传说史料中的具体年代，并结合现代测年方法来为古史断代，殊不知记载中的年代越具体越可能存在问题，现代测年方法也有一定的相对性；或过分关注已经发现的大型城址或聚落，并急于将其与文献记载中的都邑逐一一对应等。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徐中舒就提出虞夏为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太昊少昊为黑陶文化（龙山文化）^②。50 年代，范文澜又推测仰韶文化可能为黄帝时代文化^③。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对五帝时代进行考古学探索的学者日益

① 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序言》部分第 1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② 丁山：《由陈侯因簠铭文黄帝论五帝》一文《附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3 卷 4 期，1933 年。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53 年。

增多。多数人倾向于从宏观上对考古和传说两个古史系统进行把握，如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序言》所做的那样。当然也有一些较为具体，如对三苗文化^①、东夷文化^②、陶唐氏文化^③的探索等，问题是这些探索多只是着眼于一时一地，缺乏较为综合而全面的考虑。最近还出现了综合讨论五帝时代的专著《追寻五帝》和《五帝时代研究》^④，但似乎缺乏一些必要的基点。可实际上随着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日趋完善，对五帝时代进行较系统的考古学探索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我们现在进行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探索，在方法方面，除由近及远和点面结合这两条外，还应当特别注意两点：一是战争冲突在考古学上的反映，二是部族集团的辗转迁徙在考古学上的反映。激烈的战争有可能会造成文化上的巨变现象，部族集团的迁徙可能会引起文化格局的明显变动，并常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这都是比较容易引起注意和易于辨别的。以考古学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来证实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由此确立若干基点，并进而探索其他细节，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时代中国古史的基本脉络。

四、我对中国古史的考古学探索之路

我对古史传说最初产生兴趣，缘于神话故事，乃至神怪小说的熏陶。我在老家农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一遍遍地阅读《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怪小说，那都是经“文革”之劫而侥幸残存下来的民国时期的版本。1982年上陇西师范后，我又阅读了袁珂编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开始知道哪些是真正的中国上古神话，哪些是后来逐渐产生的。可像尧、舜、禹这样的人物还属于神话人物吗？大禹治水、尧舜禅让是否有其历史真实的一面？这些从当时的教科书中还不能完全得到答案。带着对古史神话的兴趣，我在1987年考上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上大学以后，要学习专业课，还要花大量时间阅读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著作，当然还有金庸等的武侠小说，对古史传说的兴趣实际上暂时被搁置了起来。记得直到大四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同学去当时的考古系主任严文明先生的家里，说起自己对神话古史的一些幼稚的想法，严先生认真地说，如果想真正了解古史，那得看顾颉刚编的《古史辨》和

① 俞伟超：《先秦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10期。

② 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9期。

③ 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史前研究》1985年4期；王文清：《陶寺遗址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④ 郭大顺：《追寻五帝》，商务印书馆（香港），2000年；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当然还有蒙文通的《古史甄微》。如果看书太杂而没有分辨，只会越看越乱。我如梦初醒。原来古史传说是那样的错综复杂，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梳理、考证，才可能发现其中蕴含的真实。顾颉刚等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整理古史，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成果正是我们今天研究古史的立足点。1991年我被推荐上硕士研究生，导师正是我素所景仰的严文明先生和张江凯先生。导师指定我们阅读顾颉刚、徐旭生等前辈的古史方面的著作，并给予适时的指导。我才算真正开始了对中国古史传说的了解过程，而兴趣也日渐浓厚。

1992年秋季，作为研究生阶段田野实习的一项主要内容，我和当时还是博士生的宋豫秦老师一起奔赴河南，与驻马店市文物管理所的李亚东一起主持发掘了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多数人知道的大概是这次发掘在环境考古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而不知道其对梳理豫东南地区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谱系也有关键性的意义。一开始整理发掘资料时，我对该遗址龙山时代遗存的阶段性差异感到惊讶，后来我逐渐认识到其中龙山前期遗存基本同于江汉文化系统的石家河文化，而龙山后期遗存则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的王湾三期文化。这可是一个十分引人注意的重要现象！在此基础上，我进而发现，在豫南和湖北大部地区的龙山前后期之交都存在类似的文化上的巨变现象，其实质当是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替代或强烈影响。规模如此之大的文化变迁，又发生在作为中国核心地带的中原江汉区域，决不可能在古史传说中没有一点踪影。它实际上就是《墨子》等书记载的“禹征三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考古学上的具体反映。而一旦这种认识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夏王朝的上限在龙山后期之初，同时我们也就有了一个进一步探索夏之前传说时代古史的可靠基点。我相信这一点会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有了这些思考，我不但完成了硕士论文，还写了《禹征三苗探索》、《王湾三期文化研究》两文，前者直接论述禹征三苗事件，后者是相关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梳理。后来所写《斜腹杯与三苗文化》一文也是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延伸。

1994年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工作。由于有了“禹征三苗”这次成功的尝试，我就开始把大量精力花在对传说时代古史以及夏代历史的探索方面，并发表了一些论文。其中1996年发表的《中国上古时期三大集团交互关系探讨》，从宏观角度讨论了华夏、苗蛮、东夷三大集团的交互关系及其在考古学上的表现，以及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1997年发表的《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一文，将夏商文化的分界放在二里头三、四期之交，将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作为晚期夏文化，将王湾三期

文化后期作为早期夏文化，并将夏的起源一直前溯到晋南地区的庙底沟二期类型。1998年发表的《先商文化探源》一文则将早期先商文化定位在龙山后期，对王亥仆牛和上甲微伐有易氏等事件也进行了讨论。当时的一个直观感觉是，晋南是夏之前古史的关键所在：夏人的源头在晋南，尧所代表的陶唐氏也在晋南。但夏人和陶唐氏是什么关系？由于对晋南没有深入的研究，对晋南以北的北方地区更缺乏了解，因此一时无从着手。这期间我还写了《西山古城兴废缘由试探》、《苗蛮集团来源与形成的探索》两文，对东夷和华夏、东夷和苗蛮集团的密切关系给予了进一步关注。

1996年我考上博士研究生后，导师严文明先生指定我主要研究华北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在整理已有考古发掘资料的基础上，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意识到通过这次机会，就有可能把北方直至江汉地区文化贯通起来考虑，一定会使我在古史探索之路上取得新的进展。1997年后半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田广金和郭素新老师的热情帮助和指导下，我开始系统复核整理他们自1982年以来在岱海周围发掘的一大批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记得当时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老虎山遗址突兀的大石头上，冥想着古人坐在这石头上的音容笑貌。他们的孩子也如今天的孩子们这样顽皮可爱吧，他们的老人一定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族属集团吧。是啊，老虎山文化与古史记载有联系吗？我和田广金老师在餐前饭后总讨论这些问题，但一时没有答案。

为准备博士论文，1998年暑期我在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等地进行了短暂的调查参观，其中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资料给了我深刻印象。陶寺遗址主要分庙底沟二期早段、龙山前期、龙山后期三个阶段，其中龙山前期遗存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特点，既明显与以前的庙底沟二期类型不同，也与和老虎山文化有亲缘关系的包含鬲的龙山后期遗存有着显著差异。也就是说，这类被称为陶寺类型的遗存，其出现和消亡都不是当地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其背景应当与人群的移动和相互间的激烈冲突有关。我以为这两次文化变迁正好与古史传说中的“唐伐西夏”和“稷放丹朱”事件对应。如此一来，则不但将陶唐氏与陶寺类型、姬周早期与陶寺晚期类型联系到一起，而且也进一步确证了夏人的源头在晋南，还可以进而探讨老虎山文化与姬周先人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这些正是《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和《先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两文的主要思路。而为了使这些推论更为可靠，我还对晋西南豫西地区龙山时代前后的文化谱系进行了梳理，写成了《晋西南豫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一文。由于已经基本可确证陶唐氏尧及其文化，这就为进一步探

索古史提供了又一个更早的基点。由此前溯，我写了《涿鹿之战探索》一文，提出炎黄时期相当于仰韶文化前期，庙底沟类型、半坡类型、后岗类型对应传说中的黄帝、炎帝、蚩尤族系。如果该观点能够成立，那就是探索古史的最早的一个基点。禹征三苗、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加上涿鹿之战，既是五帝时代最为重大的几个事件，也是我从事古史探索的几个立足点，我戏称其为“三部曲”。

我原本计划在此基础上对五帝时代古史做更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写成一本专著，可因各种原因而难能如愿。虽然现在中国社会一般民众对五帝的关注热情越来越高，但学术界总体对此还持冷静观望态度，五帝时代古史的考古学探索这样的课题还不容易得到理解和支持。虽然我对此情有独钟，但为生计，我也只好把主要精力放在别的研究方面。与其这样无期限的等待下去，还不如将已经发表的有关论文整理结集出版，再适当增加一些新的内容，这样就算对自己暂时有了个交代。

本书所收 14 篇文章，其中第 1、10、11、13、14 篇是和杨新改合作完成的，除最后一篇外，其余均为论文。前 12 篇已经发表过，基本保持发表时的样子，仅对个别字词方面的错误作了修改，对注释作了规范，还根据出版需要制作或修改了插图。论文发表后，我发现不断有新的考古资料能够进一步印证我提出的某些观点，同时有的论文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这些我都在有关论文后的“附记”中加以说明。第 13 篇论文为新近所作，试图对以华夏为核心的五帝时代的古史体系从考古学上作一个较为宏观的观察。最后一篇小文是严文明先生给我布置的作业，主要从文献角度对传说时代文化方面的表现略做梳理介绍，并简单提到考古学上的一些对应情况，不少地方其实已超出了五帝时代的范畴。要说明的是，本书中不少认识还很浅陋，提出来仅供学者们批评。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感谢恩师严文明先生对我多年的培养和教导，感谢李伯谦、张江凯、田广金、郭素新、赵辉等老师对我的鼓励和帮助。还要特别感谢本书责任编辑潘占伟先生。

今年我的父亲和母亲正好都已到花甲之年，我愿意把这本小书献给他们作为寿礼，祝他们健康长寿！

韩建业

学苑出版社文物考古、博物馆、鉴定收藏类图书已出版书目

文物考古类			
序号	书 名	作者	定价(元)
1	文物学	李晓东 著	39.00
2	考古学:追寻人类遗失的过去	曹兵武 著	26.00
3	文物保护法概论	李晓东 著	28.00
4	牛河梁遗址(精装)	郭大顺 主编	150.00
5	张学海考古论集	张学海 著	28.00
6	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精装)	滕铭予 著	50.00
7	花粉分析与环境考古	周昆叔 著	56.00
8	考古人和他们的故事(1)	郭大顺 著	16.00
9	考古人和他们的故事(2)	汪宁生 王学理 李仰松 著	29.00
10	发现中国:2004年100个重要考古新发现	中国文物报社 编	46.00
11	发现中国:2005年100个重要考古新发现	中国文物报社 编	44.00
12	定陵发掘亲历记	庞中威 著	19.00
13	最后的守望	刘君 著	28.60
14	泛槎考谜录——十二历史悬案揭秘	徐作生 著	26.00
15	远古的访问——十个考古者的寻找与发现	尼沙 著	25.00
博物馆类			
序号	书 名	作者	定价(元)
1	博物馆观察——博物馆展示宣传与社会服务工作调查研究	曹兵武、李文昌 主编	34.00
2	博物馆展览——策划设计与实施	曹兵武、崔波 主编	33.00

3	记忆现场与文化殿堂——我们时代的博物馆	曹兵武 著	28.00
4	博物馆的记忆与想象	李让、李文昌 主编	48.00
5	当代西方博物馆发展态势研究	杨玲、潘守永 主编	28.00
鉴定收藏类			
序号	书 名	作者	定价(元)
1	古今名牌钟表鉴赏与收藏	沈忠林 著	39.00
2	青花瓷断代与辨伪	杜卫民 著	28.00
3	彩瓷断代与辨伪	杜卫民 著	28.00
4	古玉器断代与辨伪	张蕾 著	38.00
5	大家谈收藏·陶瓷(一)	中国文物报社 编	25.00
6	大家谈收藏·陶瓷(二)	中国文物报社 编	25.00
7	大家谈收藏·书画(一)	中国文物报社 编	25.00
8	大家谈收藏·书画(二)	中国文物报社 编	25.00
9	壮陶阁书画录(上下册)	(民国)裴景福 撰	148.00
10	鉴古一得(修订版)	史树青 著	25.00
11	龙泉青瓷赏析	石少华 著	25.00
12	明末清初瓷笔筒辨伪识真	李臣 著	68.00
13	中国陶瓷款识总览	刘锋 著	18.00
14	中国近现代名画家印款手册	金实 著	18.00
15	古玩鉴定与辨伪	弇奚 著	24.00
16	古钱的故事	何林 著	18.00
17	民俗钱图说	何林 著	68.00
18	民间寻瓷记事	李臣 著	28.00
19	增广百家姓印谱	胡琦峻 编	78.00

20	闲话藏书	陆昕 著	28.00
21	藏事纷纭录	李维基 著	18.00
22	简明典当学	李沙 著	36.00
23	典当基础知识	李沙 著	28.00
24	现代典当通论	李沙 著	29.00
25	拍卖·收藏·典当	李沙 著	25.00

目 录

前言	(1)
禹征三苗探索	(1)
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	(17)
涿鹿之战探索	(23)
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	(35)
先商文化探源	(43)
先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	(53)
中国上古时期三大集团交互关系探讨	(65)
斜腹杯与三苗文化	(73)
西山古城兴废缘由试探	(81)
苗蛮集团来源与形成的探索	(87)
王湾三期文化研究	(97)
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	(119)
以华夏为核心的五帝时代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	(149)
古史传说中的原始文化	(171)

禹征三苗探索

—

禹是中国古史传说中一位伟大的人物，他有两大功绩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一是治水，二是创建夏王朝^①。在当时“万国”林立的形势之下，认为禹“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②，那显然不合情理。夏后氏能脱颖而出，不过因为它是部落邦国争战中的胜利者而已，“禹征三苗”便是夏后氏禹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场对外战争。

《墨子·非攻下》记载了这次战争的情况：“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搃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似乎是禹乘三苗发生天灾内乱之际突然入侵，三苗惨败并被彻底征服。宗庙被夷，“子孙为隶”^③，三苗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禹征三苗其实是尧、舜以来“华夏”与“苗蛮”两大集团之间斗争的继续^④，只不过因为此时华夏族实力大长，对土地资源、劳动力和财富的需求更为迫切，故战争进行得更惨烈。此前，“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吕氏春秋·召类》），说明在尧、舜与三苗的冲突中，华夏族已占上风。

战争的起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掠夺财富和劳动力、争抢地盘以外，宗教习俗上的歧异也是其中之一。《尚书·吕刑》有这样的记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皇帝哀矜庶戮之不幸，报虐以威，遏

① 《古本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太平御览》八十二）；“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文选·六代论》注引）。《论衡·谢短》：“夏始于禹，殷本于汤，周祖后稷。”

② 《淮南子·原道训》：“昔者夏桀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③ 《国语·周语下》：“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丁民。”

④ 徐祖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